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方向标

——重读《西安半坡》有感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历程中,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迎来全面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背景条件,而1954年至1955年则是这个全面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是体现这个转折的重要代表,而《西安半坡》这一田野考古专刊,又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的具有方向标意义的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发生转折的代表

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夏,由石兴邦主持共进行了5次。其中第1次发掘和第2次及其以后的发掘,其学术背景与目的有着很大的区别。

1950年至1954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包括整个中国考古学,“虽说已有相当开展,但事实上还处在大力培养干部,组织各地力量,迎接大发展的准备阶段”。这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于华北、西北、东北,以及华东、华南与西南新发现了2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研究方面仍然处于对细石器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硬陶文化四个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面貌的初步认识,缺乏对重要典型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和对有关资料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与比较研究。西安半坡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配合培养考古专门干部,即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三期100多位学员的实习而开展的。

西安半坡遗址第一次发掘,因一开始工作人员较多,揭露面积600多平方米,是我国大面积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尝试。发现了包括F1大型长方形房址在内的数座房址和圈栏遗迹,一批窖穴、灶坑、以及居住区内的几座瓮棺葬。出土200多件石器、一大批陶器与彩陶、300多件骨器、部分蚌制品、以及一罐粟粒等。这些发掘收获,对于我国以

往历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而言,尤其是关中地区已发现的40多处同类遗址仅是采集一些标本而言,是空前的丰富。展示了大面积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研究氏族社会生活的广阔前景。

西安半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于1955年7月至12月进行。这次发掘相对于第一次发掘,在学术思想方面,有三个方面的充分准备。

一是尹达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尹达于1954年6月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当年12月,尹达提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应着眼于复原原始社会的研究。当时他指出:“在我国,从原始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研究工作,正有赖于考古学者的大力支援,正有赖于丰富的地下资料的发现和整理,这将有助于我国古代社会历史中某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历史理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忽视,都会造成历史科学中的损失”。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明确要求开展“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存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希望能在一定地区作标准的发掘工作,全面而系统地加以整理,然后把各地区的带有典型性的遗址,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看出仰韶文化的全貌,才能够进一步和其他文化遗存作比较研究。”

二是学习苏联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经验,尤其是以研究氏族的聚落址(居址和住宅)为基本任务的特黎波里聚落址的发掘经验,使得发掘中有效地处理各种发掘现象。

三是积累了第一次发掘半坡遗址的经验,尤其是大面积发掘工作的经验。对遗址的堆积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认识到这是一处保存很好的村落遗址。

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学术思想的准备,西安半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开始朝着以全面揭露村落遗址,研究、复原氏族制度的社会生活图景,以及探讨

河南至甘肃的仰韶文化不同分布区内的文化关系为目的的方向而展开。

半坡遗址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 5000 多平方米,其中在居住区揭露 2500 平方米,发现 32 座房址等大量遗迹与遗物。在居住区以北发现墓地,发掘墓葬 130 多座,获得大批人骨与随葬品及葬俗资料,奠定了半坡遗址发掘的主要成果。

半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展示了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有效的发掘方法。在第四次发掘半坡遗址之后,石兴邦主要依据发掘半坡遗址积累的发掘经验,撰写并公布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方法与注意事项,成为指导我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与研究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半坡遗址的发掘还为紧接而来的配合国家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宏大工程而展开的各种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起到了示范作用,看到了开展大规模发掘的喜人前景,由此掀起了全面揭露新石器时代居址或墓地的一股研究热潮。同时还开启了我国为研究、复原氏族社会生活情景为目的的考古学的探索研究方式。

半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指出了—个发展方向,是 1955 年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发生了重要转折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标志着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西安半坡》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方向标

《西安半坡》是以公布西安半坡遗址 5 次发掘约 10000 平方米所获的资料及其整理、分析、研究的成果为目的的田野考古专刊,是将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研究氏族社会各个方面的成果揉合为一体的一种专刊形式。由主持半坡遗址发掘的石兴邦负责,并与金学山、杨建芳共同编写,于 1963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西安半坡》的编写体例特点与主要内容

《西安半坡》全书共分六章,全书结构,除了承袭自梁思永开创的我国田野考古专刊编写体例外,紧紧围绕揭示氏族社会的聚落及其生活情景与特征为目的而展开的。所以书名加上了副标题:“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由于编写专刊的立意新颖,研究方向明确,所以在对发掘的具体材料的分析,以及研究氏族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的许多方面的认识,都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首次探索,开创了以考古资料全面揭示氏族社会的研究范例。这在全书的六章中有着充分的体现。由此也

形成了其独特的田野考古发掘专刊的风格。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西安半坡遗址所在的关中地区这一大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已发现的与半坡遗址同时期的 400 多处仰韶文化遗址在关中地区的分布情况与特点,以表现半坡聚落所处的当时的人文条件。同时还介绍半坡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过程,以及发掘的原初动机,并公布遗址发掘探方平面图和遗迹分布平面图,使读者对半坡聚落址的平面结构与内涵有个大致的了解,便于对以下各章节的阅读与研究。这种表述方式为后来许多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专刊所继承。

第二章为聚落的范围和房屋的分布及其他建筑遗迹,是全书中表现当时氏族公社的规模、形态、特征和生活情景的核心内容。分为居住的房子、储藏东西的窖穴、饲养家畜的圈栏、沟道,以及文化堆积的形成等五节叙述。在详细介绍发掘的房子时(包括柱洞与灶坑等遗迹),还公布了对有关典型房子的复原研究的认识。这是需要在发掘过程中仔细观察分析各种发掘现象之后才能够进行的一项探索工作,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首次注意探索的一项内容。同时还依据发掘现象探讨了所发现房屋的早晚分期与早晚不同时期的房屋特征,同时期的房屋平面分布状况与特点,以及房屋建筑的程序和有关的技术问题。这些都是通过在发掘现场对发现的遗迹现象进行十分细微的观察与分析才能够有所认识。尤其是对房屋建筑的程序 and 技术的探讨与认识,成为我国聚落房屋研究的典范。

第三章为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从使用功能的角度来介绍发现的各种质地的出土物。如属生产工具的农业生产工具、渔猎工具、手工业工具等。在客观介绍各种工具的形制与特点时,还探讨其使用方式,复原各种工具的安装把柄的形式,并以明了的复原图表示,以充分表现其使用功能。又如将日用生活用具的陶器分为饮食用的器皿、水器、炊器和储藏器来介绍,同时也以专节介绍陶器的质地与颜色、纹饰、早晚的特征与分期等。这种以探讨功能来介绍出土物,尤其是对石质生产工具使用方式的复原,是《西安半坡》开创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第四章为工艺品的制造技术。分为石器的制造技术、骨角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制造技术、纺织品的纺织技术等四节。根据出土物探讨其制造技术,以反映当时的手工艺的发展状况与特点,是《西安半坡》开创的又一个研究领域,而且观察分析十分细微。如分析石器的制造技术,不仅观察分析了

石器的打制法、琢制法、磨制法三种石器制造的成形方式,还探讨了石料的切锯与穿孔的各种方式,并且以图表示,使读者一目了然。如分析陶器的制造技术,分别分析了各种陶器器底的做法、器壁的做法、口唇部分的做法、器形和器壁的修整、如何加彩和装饰,以及各种形制的陶窑及其功能与作用等,描述十分细腻。又如分析纺织技术,以分析纺织物的印痕,详细的剖解斜纹编织法中的人字纹编织法、辫纹平直相交法、条带式编织法,以及缠结编织法、绞缠法、棋盘格式间格纹编织法等。如此细微地分析各种器物的制造技术,是《西安半坡》的首创,而分析的各种制造技术,对于后来开展的模拟实验考古具有重要的启迪。

第五章为精神文化面貌。分为反映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文化遗存和艺术、墓葬等方面所表现的精神文化面貌两节。第一节是客观描述并分析研究种种艺术遗存的特征与特点。如种种彩陶图案、雕塑品、乐器(陶哨)、各种质地与种种形式的装饰品、陶器上的种种刻划符号,以及介绍发掘的墓葬资料并分析阐述当时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其中分析研究具有半坡类型特征的彩陶鱼纹的演变规律与特征,仍是至今彩陶图案分析中最为经典的研究实例。而对所发掘的墓葬资料的介绍,从围绕说明当时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展开,在阐述了仰卧直肢葬、俯身葬、同性成年人合葬、瓮棺葬等葬俗外,还详细分析了“割体葬仪”与使用棺板葬具的小孩厚葬葬俗。成为研究仰韶文化“割体葬仪”习俗与使用棺具葬俗的最早认识。

第五章的第二节主要是在第一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研究当时的精神文化面貌。重点探讨了陶器的造型、彩陶纹饰和雕塑等艺术形象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当时的图腾崇拜问题,推想彩陶上的鱼纹可能是当时图腾崇拜的徽号,探讨了各种埋葬习俗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和原始宗教信仰,并引证许多民族学资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首次广证民族学资料的研究实例,还探讨了祈求丰产的祭祀活动问题和当时的巫术问题。这些研究都是开先例的,对后来的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六章是全书的结论,是对半坡氏族公社的总考察,也即是全书所要阐述的学术目的,揭示氏族社会的制度以及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各种情景。在这一章里,归纳总结了前五章所介绍的资料及分析认识,全面考察作为一个氏族的聚落生活与生产的总体情况。如聚落的建设与布局、房屋结构与生活设

施、食物种类与经济结构、生活日用品与衣着、艺术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内涵等生活状况,农业生产、饲养家畜、狩猎与捕捞,采集的主要内容、种类、方式及其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各种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的制作与物品的储藏等生产活动状况。还重点考察了氏族组织结构及有关的制度、社会分工、平时活动人口数量等研究氏族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最后还阐述了仰韶文化的类型区分、年代、源流、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等。

《西安半坡》还有四个附录。即分别由颜闾、吴新智等人分析研究的《半坡人骨的研究》,李有恒、韩德芬分析研究的《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周昆叔分析研究的《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形成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分析、植物考古分析等三种辅助研究的先驱成果。附录四为《图版器物索引表》,以弥补正文中介绍的出土器物仅标明器物整理号而没有器物标本号的缺陷。

《西安半坡》的第六章,在全面公布发掘 10000 平方米的资料的同时,对涉及到的能够反映氏族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入的剖析,所以章章有新意。大凡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民族学研究、原始社会与氏族制度的研究、原始宗教等研究的读者,都能够从中受到启发与教益。

2. 《西安半坡》的学术作用与意义

《西安半坡》是以一个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全面揭示一个聚落的生活生产的各种情景,以研究氏族社会的组织、制度及其特征与特点,复原我国原始社会的一个横断面。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大创举。该书中对聚落及其房屋、工具、彩陶图案、葬俗等遗迹的细微分析,广证民族学资料以便合理解释考古学现象,以及深入分析、充分应用考古学资料,探索研究氏族社会活动的各种内涵,都是各相关研究领域中的首次探索与创新,大都成为各研究领域的后继者从事相关研究的蓝本。《西安半坡》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具有方向标的作用,既使以当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目标与要求来审视,《西安半坡》仍然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方向标。

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与《西安半坡》的学术作用与意义是相当广泛的,几乎覆盖当代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聚落考古与氏族社会的研究。聚落考古是近 20 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及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

题所特别注重的方面，并实施了区域考古调查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进西方考古学思想的结果。其实，50年前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与《西安半坡》的编写，即开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聚落考古的先河。例如当时将半坡遗址放在浐灞两条渭河支流的小区域的人文环境条件以及通过动物、植物遗存分析复原当时自然环境条件下来考察。对聚落本身的考察着眼于聚落的全貌而不是某一局部。对聚落的内涵考察，将各种遗迹与遗物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分析，而且尽可能地复原其原貌，使死的考古学材料成为活生生的聚落生活与生产活动的画面。其研究的内涵涉及现在所划分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民族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类体质学与人口学、景观考古、建筑考古、原始宗教考古等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领域。纵使现今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没有形成众多的分支学科像《西安半坡》那样作用于一个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的现象。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考古如何进一步地开展，在时隔50多年后仍然需要从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寻找启示。

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原本主要是通过民族学的研究去阐述。在我国，从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开始，将阐述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而展开了实质性的探索与研究，并将我国原始社会历史的探讨，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安半坡》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紧紧围绕复原氏族社会的聚落生活与生产的画面，探讨氏族制度而展开的。对聚落的宏观分析和对各种遗存的细微考察都不离其本，以至于全书的编写体例也不同于通常的考古发掘专刊，而是在探索一种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研究阐述氏族社会制度的专刊形式。其对氏族社会探索的内涵与深度，基本上为其后30年在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框定了范围。值得深思的是，在考古材料空前丰富的当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虽然大力提倡深入开展聚落考古研究，但是在以聚落考古为题而探索氏族社会制度方面，进展甚微。具有中国考古学传统的通过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以探索复原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及其生产生活情景，在当今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是否应坚持与发展呢？重读《西安半坡》会有重要的启发。

西安半坡遗址发掘过程中以及后来的整理与研究中，忽视了不同时期聚落的变化，尤其是其分析确定的晚期实际上包括了至少三个发展阶段、跨

度达500年以上的遗存，也是《西安半坡》留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启示我们在分析研究聚落址时，必须“严格掌握地层，从地层关系出发，注意不同时期聚落布局的变化”。《西安半坡》的这个启示，是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大规模发掘聚落址，又因为当时整个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前后近两千年发展的文化面貌的认识不足，这是时代的局限。而这之后的我国聚落考古研究，虽然大都是在已经明确的不同文化类型与不同期别中考察聚落址的状况，但其平面遗存所跨越的时间仍然达数百年，即将发现的数百年间形成的各类遗存作为一个时间平面进行考察和研究，而且大都还是不十分完整的聚落形态。这种研究状态，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们将研究聚落的平面遗存的年代跨度，控制在100年以内或是50年以内，那么聚落考古研究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个飞跃。这应是《西安半坡》的这个启示为我们指明的又一个探索的方向。

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及其《西安半坡》的出版，是我国第一次开展的大规模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尝试，它确立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掀起了仰韶文化研究的热潮，开创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崭新的局面，树起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方向标。同时还造就了一批新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

注释：

尹达：《新石器时代·再版后记》，第247页，三联书店，1979年。

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的发现——西安半坡》，《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

尹达：《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当时石兴邦先生还翻译了由T.C. 帕谢克所著的：《特黎波里居址的田野考查方法》一文，见《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工作队：《西安半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石兴邦：《略谈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遗址的发掘》，《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索》，《文物》2006年第5期。

严文明：《中国史前聚落的考古研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